

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及其對家庭母語 保存的影響*

張學謙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運用 Spolsky (2004) 的語言政策理論架構，從語言管理、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這三方面討論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其語言規畫常被視為達成「必知英語的雙語現象」的成功故事。過去的研究常以官方是否成功的推行共通語進行語言規畫評估，卻忽略共通語對非共通語造成的影響。本文從語言生態的觀點出發，探討新加坡官方多語言地位規畫的社會、歷史背景，指出新加坡雖然成功的將英語打造為共通語，不過，卻是以犧牲其他語言為代價，從相關的家庭用語的調查可知，占人口多數的華族其母語也急劇流失。本文建議語言地位規畫應該以「語言生態典範」(Ricento, 2000) 為基礎，抑強扶弱，在推展共通語的同時，注意弱勢語言支援系統的建立，如此，才能避免削減式的雙語現象。形成共通語與母語共存的添加式雙語現象。

關鍵詞：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語言生態、家庭語言保存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NSC 101-2410-H-143-009-MY2) 的部分研究成果。

陽光難道不是普照世界各地嗎？我們難道不是同樣呼吸著空氣嗎？
僅賦予三個語言權威的地位，讓其他民族成為又盲又聾，這樣做，
你不會覺得慚愧嗎？告訴我，你認為上帝是如此無能，而無法賦予
公平性，或者是上帝因為太過嫉妒，而不想公平的給予？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

壹、前言

移民歷史造就了新加坡多族群文化的特色。1819年英國在新加坡島建立了殖民政權，讓這個小島成為移民運動和墾居的集中地。移民在1867年和1914年之間大批勞工由外湧進新加坡，達到移民高峰。到了十九世紀末，多族群文化特色已經成為新加坡明顯的標記（PuruShotam, 1997）。華人（Chinese）、馬來人（Malay）、印度人（Indian）、其他人種（Others）是新加坡的四大族群，簡稱CMIO（PuruShotam, 1997）。根據1957年的人口普查，這個小島擁有最少二十種語言，來自四大語系。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華人占總人口的74.1%、馬來人占13.4%、印度人占9.2%、其他人種占3.3%（Wong, 2011）。

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前，曾被英國殖民統治了一個多世紀，也曾被日本軍事占領三年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歸英國統治，開始追求新加坡自治和獨立。新加坡於50年代後期逐步取得自治權力，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擺脫英國統治，兩年後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國（徐大明、李巍，2007）。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紛紛獨立，這些新興國家通常複製歐洲的「一個國家、一種語言」的語言民族主義模式，推行單語政策，作為國家建立的基礎（Lo Bianco, 2007）。新加坡這個多語言、多種族的國家，在1965年獨立後，並沒有獨尊單一語言，而採取「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企圖以語言平等達成，國家建構（洪鍊德，2002）。在語言地位上，保留前殖民政權使用的英語外，還賦予其他族群語言平等的地位，因此，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和英語一樣都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其中馬來語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

新加坡的語言發展主要是在地位規畫及語言教育規畫。本文嘗試從 Spolsky (2004) 的語言政策理論架構，探討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研究問題有三：一、語言管理：新加坡如何規畫多種語言的地位，進行語言多樣性的管理？二、語言意識形態：影響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動機為何？三、語言實踐：語言地位規畫形成什麼樣的語言生態，對族群語言保存與移位 (language shift) 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關於第三個研究問題，本文將集中在華語推行對新加坡華族「方言」保存的影響，同時也探討華語本身未來可能的前途。¹

許多評論者都將新加坡視為語言政策成功實施的典範 (Spolsky, 2004; Kaplan & Baldauf, 2003)。相關的研究主要從問題解決模式出發，評估政府執行的語言政策是否達成官方設定的目標，而官方則常以是否成功的推行共通語 (lingua franca) 為主要考量，忽略共通語對非共通語造成的影響。簡單的說，就是缺乏語言生態的觀點。為了彌補這個缺失，本文將從語言生態 (ecology of language) 的觀點評估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Haugen (1972) 最早提出語言生態觀，他主張語言生態注重研究語言及其環境的互動關係，並且強調不僅需要描述語言的社會和心理狀況，同時也要注意這些狀況對語言的影響。Honberger (2002: 35) 總結支撐多語政策的語言生態觀的三個意識形態：「一、語言演化：語言和其他語言在生態系統中一起生存發展；二、語言環境：語言及其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互動；三、語言瀕危：要是在生態系統中，缺乏適當的環境資源，語言就會瀕危。」Rappa 與 Wee (2006: 21) 認為語言政策需要平衡多方勢力，要加入「關聯的」(relational) 概念，例如「平起平坐」(equivalence)、「取代」(displacement)、「互補」(complementarity)。本文除了討論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的變遷，還運用新加坡人口普查及相關家庭用語調

¹ 新加坡常以「方言」指稱漢語各種「語言」，如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等。這些所謂的「方言」彼此並無法互通，按理說，應該是不同的語言，而非方言。不過，「方言」這個詞，能夠顯示不同的漢語語言，在新加坡的社會語言意義，因此，沿用「方言」的用法。

查，探討共通語的推行，如何影響其他語言的存續。

本文結構如下：前言之後，第二節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的變遷；第三節討論英語和族群語言在教育的地位以及推行華語的社會運動；第四節探討語言地位與族群語言移位的關係；第五節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貳、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的變遷

語言政策深受社會變遷的影響（Cooper, 1989），因此，探討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就得考慮相關的社會語言因素，如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和文化等因素，這些非語言因素才是決定語言地位規畫的主因。

Rappa 與 Wee（2006: 80-81）提出新加坡語言政策的四項主導觀念，有助於理解新加坡語言政策的變遷，列出如下：

1. 赫德式的語言與國家關係，強調同質性的教條，將差異視為危險、離心離德，導致限縮語言的政策；
2. 為了維持新加坡族群多元社會的和諧，必須尊重和平等對待各族群，多元文化主義或是多族群主義（multiracialism）導致指派給各族群一個官方指定的母語，但也舒緩了邁向單一語言的極端傾向；
3. 承認英語在世界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缺乏自然資源，也沒有足有的農業可供外銷輸出，因此集中在開發人才，培養能吸引國外投資的工作環境和人力資源。為了和全球市場競爭，新加坡政府認為英語是接觸科學、科技的管道，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4. 在上述三項觀點背後都有「憂患意識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survival）或是「實用至上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pragmatism）。政府的政治論述常採用「危機敘述」（crisis narrative）的形式點出迫在眉睫的問題，然後引進政策並說明這是解決危機最有效、最理性的方法。

以下參考 Kaplan 與 Baldauf（2003）將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分為四個時期：一、二次大戰前；二、二次大戰後；三、與馬來西亞的合併及分離；四、獨立國家階段。

一、二次大戰前的語言地位規畫

二次大戰前英國殖民時期的語言政策雖然「獨尊英語」，以之為唯一的官方語言，政府施政的立法、行政、公告都是以英文為本，不過，並未壓制其他族群語言的使用，容許族群語文報紙的發行，也開放族群源流的學校（郭振羽，1995）。殖民當局「分而治之」的策略，倒也給新加坡發展出四大主流學校教育，不過，這些學校都是用單一語言進行教學，這樣的單語制，讓各族群之間難以互通有無。華人透過方言組織成立學校，一開始以方言授課，後來受到中國的影響，1917年華語成為華校的教學語言，1919年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教育。新加坡的華校教育是獨立前最普及的教育，學生人數甚至曾超過「英校」（徐大明、李巍，2007）。雖然，英國殖民時期多種語言並存，不過雙語人口並不多，這和族群人口居住區域集中，以及殖民當局「分而治之」的政策有關。當時的社會語言狀況就是費許曼（Fishman, 1972）所說的「雙言非雙語」的現象（*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英語充當高階語言，其他語言淪為低階語言，不過，彼此又無法互通語言的狀況。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聯繫透過「中間人」進行。二次大戰之前，英國殖民政府主要重視在商業和貿易的利益，並不關心語言或是教育（Kaplan & Baldauf, 2003）。

二、二次大戰後：語言平等原則的確立

二次大戰後，新加坡開始追求自治與獨立，語言地位的法制化受到重視，進行一連串的語言規畫。五六十年代，語言問題曾造成新加坡的種族和政治衝突。一開始是因為華語遭受不平等待遇，而展開抗爭。戰後英國殖民政府為了擺脫華校引發的社會衝突，以英校取代華校以及強迫華校轉用英語教學的手段，試圖消滅華文教育體制，結果引起華人的不滿和對抗。爭取華文教育平等待遇的運動，在1955年6月6日，成功的動員了603個華人社團代表參與，又成立「華文教育委員會」爭取華語與華校的平等待遇（黃庭康，2008）。為了平息民怨，新加坡政府於1955年成立「各黨派調查華文教育委員會」，負責檢討華文教育的問題。新加坡政府於1956

年發佈「各黨派調查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以下簡稱「各黨派報告書」）。該報告書對新加坡日後的語言政策制定有著深遠的影響，最為重要的是，族群平等原則的確立。報告書從社會語言多樣的事實出發，反對壓制，要求保有族群語言與文化，確保族群的認同與尊嚴。另外，各黨派報告書指出「平等化策略」的建議，應當適用於所有的族群，主張「不應該孤立對待華文教育，不論我們提出任何建議，都應該適用於所有的種族，也就是應該毫無保留地平等對待華文、馬來、印度、與英文教育」（黃庭康，2008: 118）。各黨派報告書中，跟雙語教育政策有關的條文主要為（董霄云，2008: 76）：（一）平等對待以各種民族語言為教學用語的語言源流學校；（二）學校至少應該教授兩種語言；（三）各種不同的語言源流學校採用相同的課程標準。

三、與馬來西亞的合併及分離：馬來語為國語

新加坡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語言不公，催生了族群語言平等的原則；接著在追求獨立時，卻又獨尊馬來語為國語，不過，仍然保有多元承認的原則，將其他族群語言定為官方語言。新加坡在追求與馬來西亞合併以及獨立初期的語言地位規畫，就是獨尊馬來語的多語政策（郭振羽，1995）。多語原則已經在各黨派報告書獲得承認，獨尊馬來語為國語，並嘗試提升馬來語為共通語的原因，則與當時新加坡的國家想像有關。新加坡人口不多、地方不大，一直到 1965 年退出馬來西亞聯邦之前，沒有多少人認為新加坡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因此，新加坡的執政者認為處於馬來大海的新加坡小島，最終還是得跟馬來人佔多數的馬來半島合併（黃庭康，2008）。新加坡於 1953 年成立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當時新加坡人的政治發展目標是與馬來亞聯邦合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因此，在語言地位上賦予馬來語崇高的地位。這樣的做法可能引來華族和印度族認識的疑慮，因此這段時期在語言地位論述方面，有不少是說明何以需要以馬來語為共同語。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為何不採用華族的語言作為共通語？畢竟華人是新加坡人口最為多的族群。1959 年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成為執政黨，行動黨必須爭取華人群眾的

支持，反擊政府試圖消滅華人文化的指控，因此，推行平等化策略，對四種源流的學校一視同仁；另外，也考慮到行動黨試圖與馬來半島合併，爲了避免讓馬來半島的馬來人認爲新加坡是「第三中國」、「小北京」或是「強烈的中華沙文主義者大本營」，因此，刻意避免過度華化，當然不可能讓華語成爲國語（黃庭康，2008）。

人民行動黨於 1957 年發表『五年計劃書』，重申新加坡應該以馬來語爲共同語，實施雙語教育，在此，馬來語不僅是跨越不同語言溝通的橋樑，還被視爲跨越柔佛海峽，進入馬來亞聯邦的橋樑。Aidil (2007) 認爲從 1959 年到 1979 年這段時間是馬來語的黃金時期。1959 年新加坡成功自治邦，人民行動黨通過選舉，成爲執政黨，1959 年自治邦憲法正式將馬來語定爲國語，馬來語是學校的必修課。在馬來語學校註冊入學的人數大增，1959 年小學有 15784 人就讀馬來語小學，到了 1965 年增加到 28,247 人 (Aidil, 2007: 160)。新加坡政府積極進行馬來語推廣政策，除了成立馬來語文文化協會以及馬來語文教育諮詢文教學會，還規定所有的學校教師，須具備第一級馬來語程度，公務人員需具備第二級馬來語程度。另外，還辦理中學程度馬來語課程，成立馬來文源流中學。新加坡於 1963 年成功的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之後，還繼續推廣馬來語，包括以下語言傳播作爲（郭振羽，1995）：

1. 成立國語行動理事會；
2. 推行全國團結周以及國語月和國語周運動；
3. 增加馬來語廣播時間，馬來語節目時間，在 1954 年時佔廣播時間的 15%；1963 年增加到 20%；
4. 爲公務人員舉辦馬來文課程；
5. 政府公告及公文，開始使用馬來文；
6. 海峽時報刊載馬來文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推行馬來語文時，同時堅持不同語言源流學校平等的原則（徐大明、李巍，2007）。不過，也因為堅持多語政策，與馬來西亞聯邦的獨尊馬來語的單語政策抵觸，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導致新加坡於 1965 年 8 月 9 日宣佈退出聯邦，成爲獨立的國家 (Kaplan & Baldauf, 2003)。

四、獨立國家階段：多語並存英語獨尊的地位規畫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獨立當天宣佈，「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這不是個馬來國，也不是個華人國，也不是印度國。讓我們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論種族、語言、文化、宗教，團結一致。」（郭振羽，1995：62）。1965年新加坡國會通過的『新加坡共和國獨立法案』明確地規定各族群語言的地位（徐大明、李巍，2007：109）：

第七節

第一款 馬來文、華文、泰米爾文和英文為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文。

第二款 馬來語為國語，羅馬字母書寫系統的馬來文為國語語文，上述條款受下列條件的約束。

第一項 任何人使用、教授和學習任何其他語言的行動不能受到禁止或妨礙；

第二項 本節的內容不損害政府保存和維護新加坡的任何其他社區語言的權利。

由上列的條文可以看出，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延續獨立前，馬來語為國語的多語並重政策。總理公署於1965年10月發表的公告確立四大官方語言政策（星洲日報，1965年10月2日）：

在新加坡，四種官方語文——即馬來文、華文、淡米爾文和英文——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語文。馬來語是我們的共同語文，它是我們的國語。……新加坡的憲法將重新規定各語文向來所享有的地位，即新加坡有著四種官方語文……而以馬來文作為共通語文和國語。

不過，當初為了合併而獨尊馬來語的理由已經不再，這份公告所說的「以馬來文作為共通語文和國語」，後續雖然保留馬來語的國語地位，不過僅具象徵性功能，使用於國歌、典禮及軍隊的口號。

到了1967年，新加坡政府決定放棄以馬來語為共通語的政策，從1957年開始進行的全民馬來語推展運動，到了1967年就劃下休止符。獨立後，最重要的語言地位規畫議題是選定共通語，當局很快就恢復殖民時期以英語為尊，但承認民族語言的政策，即「多語並存英語獨尊」的政策（郭振羽，1995：64；徐大明、李巍，2007）。表面上，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

都有平等地位，國家領袖在重要慶典都會以這些官方語言發表演說，不過議員在國會的發言，很少使用英語之外的語言進行發言。就此而言，華語、馬來語及泰米爾語被設定為族群內部的語言，充當傳承族群文化的功能，並非政府部門的工作語言，英語才是實際的政府工作語言以及社會的共通語（吳英成，2010）。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四種官方語言在 1957 年時，很少人以之為第一語言，Pennycook 估計這四種語言的人口只占 18.6%（Kaplan & Baldauf, 2003: 124）。

獨立建國這時期最迫切的問題應該是打造國族認同以及確保經濟發展。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是避免獨尊單一族群的文化，強調新加坡為多元種族的國家，並且把新加坡面臨的生存危機、經濟挑戰作為激發民眾休戚與共的群體認同（Kiong & Pakir, 1996）。需要注意，英語雖然跟其他族群語言同列為官方語言，但是其他族群語言僅具有各自族群共通語的地位，並不像英語作為族群之間的共通語。新加坡政府選擇英語成為實際的官方工作語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湯雲航、吳麗君，2006）：（一）繼承英國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行政傳統，方便官方紀錄、行政和法律行事；（二）英語為中立語言，不是任一民族的母語，最能為各個族群人民所接受；（三）英語是新加坡與世界接軌的語言，英語為國際共通語，是重要的商業和科技語言。

第二點關於中立語言的論述，值得探討。在四種官方語言中，除了英語外，都有其相對應的族群，也就是說，僅有英語具有族群中立性（ethnic neutrality）的性質。選用前殖民者的語言，並不少見，主要是各族群彼此競爭語言權，加上語言嫉妒，互相抵制，導致無法採用本土語，印度和非洲國家就是如此。就非洲而言，「正是由於統治精英信誓旦旦要推廣多語制，反倒為英語的進一步傳播鋪就了道路，憲法給了太多的語言與權利，中看不中用。」（艾布拉姆·德·斯旺，2008：210）²。這項評論也適用

² 艾布拉姆·德·斯旺（2008：213）提到三項有利前殖民語言保持優勢的機制：「族群分立以及與之而來的語言嫉妒；個人偏向于選擇能借之獲取高端職位的語言；精英集團必然會選用可將（無讀寫能力的）圈外人排除在外的語言，以期壟斷好職位。」

於新加坡的狀況。由於新加坡獨立運動主要是受過英語教育的精英所主導，對英語當然有所偏愛。缺乏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很難推翻前殖民語言，改用本土語言。

中立性和實用性是合理化英語作為共通語的兩個常見論述。採用英語為實際的官方工作語言有以下的優勢（郭振羽，1995：66）：（一）英語有助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英語為西方科技、國際貿易的用語；（二）對個人而言，通曉英語對個人經濟與社會地位提升，也有所助益；（三）英語是中立性的語言，英語是唯一不與特定民族掛鉤的語言，對其他族群彼此不占優勢，不至於因為語言產生不和。中立性之外，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是支持英語的意識形態。根據實用主義的邏輯，事物的價值必須從經濟-技術理性加以衡量，認為無需考慮倫理或道德的論述（Pennycook, 1994）。Pennycook（1994: 247）把英語實用功能表述如下：「英語為中立的媒介，可以藉此獲取重要的知識，是族群之間溝通的中立媒介，以及參與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語言，也是教學的重要語言。」中立性、實用、有利等說法是為了把語言「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淡化英語本身的意識形態色彩，事實上，這種做法本身就反映了將語言視為商品的「語言工具論」（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的意識形態。根據語言工具論，「語言存在的價值在於它是否能達成特定的功利性目標，如，經濟發展、提升社會地位或是促進族際溝通」（Rappa & Wee, 2006: 24）。³ 在實用主義的主導下，英語是實際的工作語言，充當重要的垂直控制工具，儘管國家將族群語言定為官方語言（2006）。

Fishman（1971）根據大傳統（Great Traditions）的多寡或國家的意識形態區分三種國家可能採用的語言決策類型：（一）A 決策類型缺乏公認的大傳統，獨立後，常延續前殖民政府的語言為官方語言；（二）B 決策類型選擇一個具有大傳統的本土語言作為官方語言；（三）C 決策類型的

³ 相反的，一個語言不具工具價值（non-instrumentally）「要是一個語言被視為形塑個人的族群或是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份，並且其存在與社區的價值的理由是讓社區人士能維持認同感的象徵價值。」（Rappa & Wee, 2006: 24）。

地區有眾多相互競爭的大傳統存在，通常妥協出多元的模式（張學謙，2006）。新加坡族群多元又各有其大傳統，可以說是 C 決策類型，即「多元模式國家」（multimodal nation）的範例。另外，新加坡多語並存英語獨尊的政策，也符合 Stewart 所說的「多元政策」，也就是，「承認並保留若干重要語言，而選擇其中一種或若干種為官方語言，並作為國內不同群體間溝通的語言」（郭振羽，1995：57）。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有在地以及全球策略這兩個部份。在地策略方面就是採用具有地緣政治重要性的馬來語為國語，同時也照顧其他本土族群的語言地位需求，賦予官方語言地位。這個部份是基於族群和諧、社會安定的考量，堅持採多語政策與馬來西亞聯邦的單語政策對抗，甚至不惜退出聯邦。這些做法相當具有前瞻性，李光耀深知在地認同以及當家做主的重要，他說（湯雲航、吳麗君，2006：22）：

無論是好是壞，我們是在東南亞，而且永遠不能離開這個地方。我們所制訂的政策，就是為了確保我們跟鄰國在東南亞地方和睦共處，但有權在自己的家園當家作主。任何活動，任何政策都必須以這個原則為準繩。

另外，為了確保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新加坡政府採取英語作為對外的全球策略。英語主要是作為工具而非情感連結。郭振羽（1995）引用社會心理學家凱爾曼（Kelman, 1971）的「感情性的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與「工具性的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的概念進行新加坡語言政策的評估，認為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大致符合凱爾曼的兩大要求，他說（郭振羽，1995：66）：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乃是經由多語政策來謀求民族和諧與政治穩定，由英語的應用而維持經濟進步與社會繁榮。由此而產生的「工具性的依附」，在長期之後，或轉變為對新加坡的「感情性的依附」，由此萌生「新加坡認同」和「新加坡文化」。

問題是族群語言和英語分別代表的「感情性的依附」與「工具性的依附」是否真能如執政者所規畫的達成各自的語言分工，而不會有所關聯。

英語的實用價值雖然受到重視，不過，文化上的價值則受到懷疑，甚至貶低，英語成為腐化西化的象徵。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英語的中立性事實上也不攻自破，因為李光耀認為英語帶來的「文化荒蕪現象」（deculturalization）以及道德敗壞的問題（Pennycook, 1994: 247）。如何對抗英語不良文化的影響？族群母語作為認同以及英語作為工具的二分法，又被用於語言地位規畫，反映在學校課程安排。下一節討論四種官方語言在教育的地位。

參、語言的教育地位規畫

語言政策嘗試透過政府的力量改變人民語言使用的習慣。學校的教學語言和語言課程是語言政策實施改變語言使用的重要管道。新加坡的語言教育規畫反映官方獨尊英語而母語作為附屬地位的格局。新加坡除了以學校推行語言之外，還運用社會運動推行華語。本節回顧新加坡的語言教育地位政策，討論英語和母語的語言教育地位，並檢討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推行方法。

一、學校的語言教育規畫

吳英成（2010）將新加坡華人雙語形態的發展分成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華人家庭以祖籍方言（F）為主要語言，華語（h）與英語（y）次之。1950年代後，進入第二階段則以華文（H）為教學語言的華校與英文（Y）為教學語言的英校並存，祖籍方言（f）仍然活躍於華族社群。1960年代進入第三階段，實施雙語教育，華校學生須修讀英文（y）為第二語言，英校則修讀華文（h）為第二語言。第四階段（1970至1980年代）華校招生銳減，1987年停辦華文學校。1979年開始推展以華語取代祖籍方言的「講華語運動」。1990年代之後為第五期，全面以英語（Y）為教學語言，華語（h）僅為必修科，此時英語成為第一語言，華語為第二語言。

表 1：新加坡華人雙語形態的發展

1950 以前	1950	1960	1970—	1990
Fh →	Hf →	Hyf →	Hy →	Yh
Fy →	Yf →	Yhf →	Yh ↗	

資料來源：吳英成（2010：53）。

注：中大寫字母表常用語言，小寫字母為次常用語言。F/f 為祖籍方言、H/h 為華語、Y/y 為英語。

新加坡 1956 年通過的各黨派報告書根據平等原則提出雙語教育的主張，獨立後推行以英語為主同時保持民族語言的雙語教育。不過，隨著英語霸權的建立，民族語言教育從教學語言退居為教學科目之一。說來諷刺，殖民後期，英國嘗試以英語取代華校或是將華校英化，受到相當大的反彈，並未成功（黃庭康，2008），不過，原本的種族源流學校在獨立後，反而消失不見。

1979 年『吳慶瑞報告書』公布，認為過去二十年的雙語教育並未成功的培育出通曉雙語的人才，因此根據分流的原則，為不同程度的學生設定語言學習目標：沒有能力學習兩種語言的學生，只要學習英語就行，中等以及中上程度學生學習第一語言（英語）和第二語言（華語）；優秀的學生則把這兩種語言都作為第一語言學習。另外，從 1979 年開始，新加坡政府設立九所「特別輔助計劃」中學（Special Assistance Plan）培養雙語人才，規定只有小學離校考試成績最好的 8% 的考生，才可以進入這些中學（徐大明、李巍，2007）。

1987 年政府提出「人人講英語」（English for all）的口號，合併不同語言源流學校，在所有的學校內實施英語-母語的雙語教育政策，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英語教學視為母語教學，各種族語言則被視為第二語言，到了高中華文為選修課，英文為必修課（董霄云，2008；韋紅，2003）。英語成為教學媒介語，族群語言作為第二語言，僅用於母語科和道德教育科。1996 年的資料顯示，各學校華文課程占全部教學時間的比例為：小學約占 20% 到 29%，中學約占 14% 到 18.5%（周清海，1995）。1990 年開始所有

的高等教育機構全部使用英語授課（劉滿堂，2000）。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顯然未達成各族群語言平等的原則，政府重視英語，積極提倡英語，加上在升學就業等方面，都將英語列為首要條件，英語逐漸成為共通語，母語淪為附屬地位，族群語言則不斷衰微。

就像台灣的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一樣，新加坡也透過母語考試建立母語學習的獎賞系統。⁴ 雖然新加坡雙語教育獨尊英語，母語只是陪襯的角色。不過，母語仍然是必須學習的語言。新加坡政府透過將母語設為考試項目，作為學生母語學習成效的檢核，因為母語考試涉及升級或升學，母語不好的學生，有些還會請家教補習（Rappa & Wee, 2006: 90）。從1965年開始，規定母語為小學離校考試的必考科目，自1966年起，中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讀修母語課程；1969年母語成為新加坡—劍橋普通水準考試的必考科目，分流考試中，雙語成績也是重要的考評項目（董霄云，2008）；政府規定母語是學生升級以及申請進入大學必考的科目，沒有通過母語考試，大學就不能錄取（韋紅，2003）。

二、講華語運動：從文化到經濟定位

新加坡政府建國後，積極的進行語言地位規畫，最重要的就是「四大官方語言政策」和「雙語教育政策」，不過，令人訝異的是，漢語方言雖然占人口多數，卻被排除在外，沒有任何地位（許小穎，2007）。華人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華人占全人口的74.1%（Wong, 2011）。政府的人口普查把華人分為十個方言群（dialect groups）。雖然新加坡大多數的華人的母語非華語，政府仍然把華語定位為華人的母語，這種母語是不自然的官方「指定的母語」。華人中閩南語人口占人口的60%（福建話占40%；潮州話占20.1%）按理說，閩南語應該比華語更具備共通語的地位。為什麼選擇華語作為華族的通用語？

⁴ 有些反對母語認證的人會說，全世界，沒有那個國家在考母語，除了新加坡外，愛爾蘭也有母語認證考試，學生參加會考時，可以選擇英語或愛爾蘭語，以愛爾蘭語作答可以加分優待，想進入國立愛爾蘭大學以及師範學院就讀的學生，也需要通過愛爾蘭認證（張學謙，2008：31-32）。

新加坡最通行的華族共通語是福建話，選擇華語的原因應該是基於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考慮（韋紅，2003）。鄒嘉彥、游汝杰（2003）將新加坡的英語、華語和方言分別刻畫為「頂層語言」、「高層語言」和「低層語言」，他們從語言競爭力的角度分析何以閩南語不敵華語的原因：（一）人口競爭力不夠強，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口不足三分之一，不像台灣跟香港當地語言都占了 70%以上；（二）經濟競爭力低：除了跟中國及台灣的民間商業往來，經濟價值不高；（三）文化競爭力平平，新加坡的閩南語文化，不比香港的粵語活躍。這些競爭力的分析，需要考慮政府方面為了推展英語和華語刻意打壓方言，造成方言語言活力不振。至於華語何以取得高層語言的地位？鄒嘉彥、游汝杰（2003）同樣提出三個理由：（一）強勁的政治競爭力：華語運動為國家語言計劃的一部份，得到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二）獨一無二的文字競爭力：華語有較為普及的書面語；（三）背後的文化競爭力：華語記錄中華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同時也被用於對抗西方文化的衝擊。

華語作為文化堡壘的功能向來受到政府的重視。英語和母語存在著互補關係，前者作為工具性的語言，後者作為認同標記的語言。母語在雙語教育中，扮演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滿足民族認同的情感需求。李光耀（1996：419）在 1984 年推展華語運動說：

我們堅持雙語政策的一個持久不變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們無法接受英語為母語。用一種我們在情感上無法接受的語言作為母語，將會使我們的情感蒙受傷害。我們將對自己感到懷疑。我們的自信心將會被削弱。

李光耀在其他地方提及雙語教育再次強調雙語教育的重要性，認為要是放棄雙語教育，將會喪失文化，成為偽西方社會（韋紅，2003）。英語成為族群之間的共通語，而族群母語則成為族群內部的溝通工具，母語除了促進族群和諧，同時肩負著保存亞洲價值和傳統文化的使命（許小穎，2007）。

以下補充說明推展華語運動背後的三個意識形態：語言問題論、語言中立性以及語言實用主義。

對於語言多樣性（language diversity）大概有三種不同的看法：問題論」、「資源論」或「權利論」。這三種看法構成不同的語言意識形態，影響語言政策的形態，產生不同的社會語言效應（Ruiz, 1984；張學謙，2011）。新加坡政府一向把語言多樣性視為國家建立的阻礙（Rappa & Wee, 2006）。李光耀在接受 NHK 訪問時，就提及新加坡各種族群內部的多樣方言有礙建立國家一體感，並且希望新加坡能像日本一樣成為「單一民族，有著同樣的種族、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文化、同樣的宗教。」（Rappa & Wee, 2006: 88）。不過，由於堅持多元文化主義，讓新加坡政府避免將單一語言強加在三個主要族群之上，為了給予各別族群一體感（sense of unity），新加坡政府賦予各族群一個官訂的母語。華語主要是作為華族內部的共通語加以推行，官方認為方言分歧易造成族群內部分裂，不利國家凝聚（national unity），因此在 1979 年開始推行講華語運動。⁵

華語運動初期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嘗試改變家庭內方言的使用；第二階段將家庭說華語的習慣延伸到社會，如咖啡店、小販中心、商家等場所（張楚浩，1995）。1991 年之後，講華語運動的重點由改變說方言的習慣，轉變為雙語需求及文化認同。推廣的對象也市井小民，轉為接受英語教育的華族新生代（董霄云，2008）。另外，1994 年的推廣華語運動委員會的成員大都是受英語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助於消除華語為下層語言的社會偏見，提升華語的形象（陳松岑、徐大明、譚慧敏，2000）。

講華語運動的目的是鼓勵華語使用，同時降低其他中國方言的使用。每年舉辦一個月，至今仍然實施。新加坡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時常發表推動華語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以華語取代方言。陳照明（1995：97）記載了相關談話，比如說，在 1979 年 9 月，全國推廣華語運動工委會主席林繼民就明確的表示：「我們推廣華語是希望華人社會放棄方言。」1981 年王鼎

⁵ 事實上，新加坡華人之間並不缺共通語，謝世涯（1995：142）指出：「新加坡自開埠以來，方言一直是華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貿易洽談、交際與家庭的用語，尤其是閩南話，在五至七十年代，約佔全華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語。」學者估計，97% 的華人在講華語運動開展之前，聽得懂福建話（Kaplan & Baldauf, 2003: 124）。

昌部長也表示，「推廣講華語運動的目的是要以華語取代其他華族方言。」（陳照明，1995：97）。

語言問題論常導致負面語言規畫（negative language planning），限制和縮小可以選擇的語言項目，通常犧牲弱勢族群的語言權利（Kaplan & Baldauf, 1997）。新加坡政府常以族群中立性為由，推行規畫指定的語言，英語和華語都被視為中立語言，不同的是，前者作為族群之間的共通語，而後者則作為華族內部的共通語。許小穎（2007）指出，在 50 及 60 年代，福建話是華族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政府卻因為華語不是任何一個華人社群的祖籍方言，具有中立性，而被選為族群內部共通語。中立化的意識形態跟新加坡歷史有關，為了避免族群衝突，族群議題常被「去政治化」。問題是這種以中立性為名，進行取代方言的做法，顯然違反語言人權，造成語言差別待遇，更有可能造成群體對抗，而引起社會不安。

新加坡政府對英語抱持著語言工具論態度，其他母語則視為認同標記。這樣的分工，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新加坡採取工具性的語言觀，讓華語從原本的認同功能，加上實用的經濟價值（Wee, 2003）。⁶ 講華語運動和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同樣都在 1978 年。⁷ 李光耀及吳作棟都強調華語的經濟價值，認為如果忽略華語，以後跟中國做生意就沒有優勢了。華語的經濟轉向無疑提供學習華語更強的動機，因為語言存活很大部份取決於語言提供的社會升遷及經濟利益。由於華語成為有價值的經濟資產，弱勢家長要求小孩學習華語方興未艾，可能導致其他弱勢族群改學華語，造成其他族群語言流失。華語的語言工具論是附加到先前作為認同標記之上，推展華語的目的也不在於取代英語，仍然以必知英語的雙語現象作為目標，另外，推展華語以犧牲方言為代價，方言被貶低（Wee, 2003）。

方言被貶低主要是因為政府使用美化華語、醜化方言的手法進行宣

⁶ 語言工具論認為語言存在的理由在於是否能達成特定的功利性目標，如接近經濟發展和社會升遷。如果語言被視為是族群或文化認同的部份，就是非工具性的語言，其社區的功能在於提供社區成員象徵價值及認同感（Wee, 2003）。

⁷ 華文經濟價值提升的同時，新加坡政府卻也減縮華語在高等教育的地位，1978 年以中文媒介語的南洋大學與以英語媒介語的新加坡大學合併為國立新加坡大學。

傳。比如說，華語被視為是凝聚華人社群的整合力量，而方言則造成分裂；華語是優美、有教養的，而方言則被視為粗野不文，缺乏文化價值（Bokhorst-Heng, 1998: 250-51）⁸。這些手法和當初台灣推行國語的手段如出一轍。另外，跟台灣一樣，新加坡政府同樣以「錯誤的兩難」（false dilemma）來迷惑家長，讓家長誤以為母語和華語不能兼顧，必須從中擇一（cf. 張學謙，2011）。1979年李光耀的演說，就要求華人在方言和英語及華語和英語之間做出選擇（周清海，1995：48-49）：

由於我國人口當中有二十五巴仙並非華人，我們不得不採用英語作為各種族之間共同語言。如果我們繼續使用方言，那麼英語勢必成為我國不同籍貫華人之間共同語言。……這是一項無可避免的選擇：英語和華語，或是英語和方言？在邏輯上，這項決定是明顯的；在感情上，這項選擇卻是痛苦的。

值得注意講華語運動特別以家長作為宣導對象，嘗試影響家庭由方言轉向華語，讓華語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新加坡政府推廣華語就常宣傳為了孩子的未來，家長應該跟小孩說華語，李光耀在1979年講華語運動的開幕式致辭指出（董霄云，2008：94）：

我國的華族家長，為他們的子女面對這樣的選擇——是英語和華語呢？還是英語和方言？如果他們讓子女講方言，或者更糟的是，要孩子講方言，他們的子女對於學校的功課就會感到非常吃力。因此你們應該鼓勵你們的子女講華語，不講方言。

除了將母語視為學習阻礙之外，也強調家長需要以身作則，1984年講華語運動的口號就是：「請講華語，兒女的前途，操在你手裡」（許小穎，2007）。李光耀指出，講華語運動「最終的考驗，在於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在家裡是不是用華語交談，這就是母語的意義。」（陳照明，1995：98）家庭是母語保存的最後堡壘，當家庭不再使用族群語言改用華語的時候，由方言轉向華語就徹底完成了，這應該不是母語的意義，而是「母語死亡」的定義。

⁸ 具體的例證，請參考陳照明（1995：99-100）。

講華語運動運用語言行銷的手法進行語言推廣（張尹羸，2007）。除了勸說家長和學生之外，還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如包括報章、廣播電台和電視，宣傳鼓勵華人常說華語。最激烈的手段是禁止媒體使用漢語方言。另外，新加坡政府還鼓勵建立漢語拼音及漢字書寫的語言景觀，如食物名稱、公司、嬰兒命名，新街道和住宅區命名，同時還以漢語拼音取代方言拼音（許小穎，2007）。

肆、語言地位與語言移位

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社會，政府當局實施必知英語的雙語政策，一方面將英語定為各族群的共通語，充當實際的官方工作語言，一方面賦予三大族群語言官方地位。政府將英語和母語做互補性的功能分配，前者作為實用工具，後者作為族群文化認同。對於各族群內部的語言分歧，政府則指定其中一種語言作為族群共通語。家庭語言使用是語言保存的最後堡壘，也是語言能否存活的重要指標（Fishman, 1991）。從語言生態來看，語言之間互有關聯，本節將根據相關的家庭語言使用調查，檢視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對語言保存與流失的影響。

Li 等人（1997: 381-82）列出影響新加坡語言流失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因素、地位因素，次文化因素（subcultural factors）、社會文化因素等。這些相關因素中，語言政策應當扮演關鍵的角色。徐大明、李巍（2007: 118）關於新加坡語言使用的調查顯示，政府政策對族群語言轉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說：

新加坡大規模的語言轉用現象，基本上是政府的語言政策作用的結果。目前全社會的語言狀況仍然是一種不穩定的雙語狀況，大致上保持著從民族語言轉用英語的趨勢。

Kaplan 與 Baldauf（2003: 127）將政府進行的語言規畫在過去半世紀造成的影響，歸納為六項互相關聯的語言移位：

1. 從印度語移位到英語和馬來語；

2. 從馬來語作為共通語到少數語言；
3. 從漢語變體（Chinese varieties）到華語；
4. 從英語僅充當工作語言變成共通語和母語；
5. 從非標準的雙語現象到必知英語（English-knowing）的雙語現象；
6. 從文盲及半文盲到讀寫和雙語讀寫。

過去半世紀以來的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雖然造成語言流失，但也創造了一個「必知英語的雙語社會」，英語作為學校的第一語言，加上族群語言作為第二語言（Pakir, 1991; Kaplan & Baldauf, 2003: 133）。就語言保存而言，新加坡語言政策造成新加坡語言在兩方面的流失，一方面是不同的漢語語言被華語所取代，另一方面，各族群也轉向使用英語（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新加坡的案例顯示，語言政策與族群語言的延續力息息相關。

Kaplan 與 Baldauf（2003）從語言生態的觀點，分析英語和華語擴展跟地位提升之間的關係。在 1960 年到 2000 年之間，1956 年政府決定採用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雙語主義之後，英語的使用大為擴展。1979 年講華語運動開始之後，同樣可以看到華語迅速成長，同時方言隨之衰落。上述的觀察符合相關的社會語言使用調查，以下提供相關的人口普查資料以及家庭語言保存的實證研究，以瞭解語言政策對語言保存的影響。

新加坡是個講究規畫的國家，政府相當注重人口普查，以之為施政規畫及檢討成效的依據。新加坡的人口普查於 1980 年開始收集「家庭用語」資料（郭振羽，1985），接著每十年進行一次，最近的一次普查是 2010 年。表二為家庭最常使用語言的四次人口普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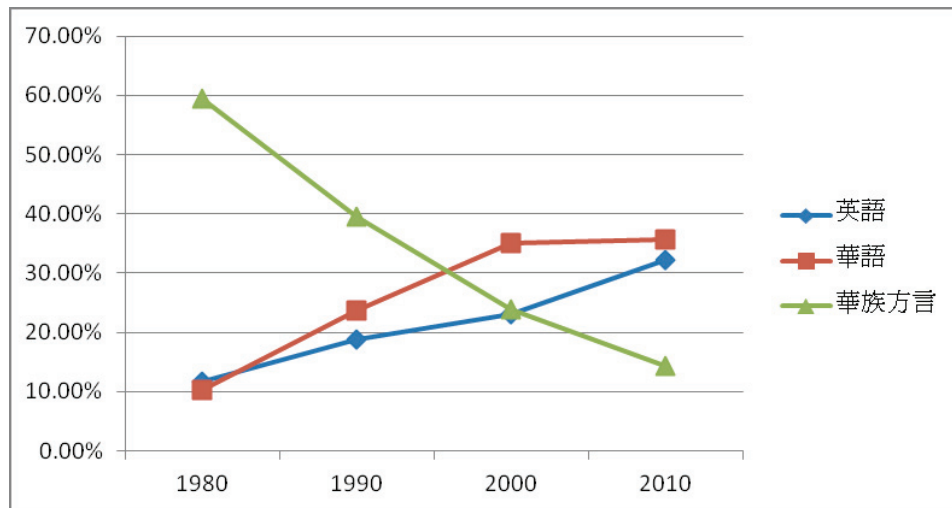
由表二可知，英語和華語活力十足，成長迅速，以英語為家庭主要語言的人口，從 1980 年的 11.6% 到 2010 年的 32.3，增加了近三倍（20.7%）。以華語為家庭主要語言人口，則從 10.2% 上升到 35.6%，增加了 25.4%。值得注意的是，華語雖然人口比率高於英語，不過，華語主要作為華族內部的溝通，和英語作為各族群的共通語，情況不一樣。除了華語和英語外，其他族群語言都有流失的狀況，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華族方言，另外三個族群變化不大。華族方言做為家庭主要語言的人口，從 1980 年的 59.8%，

到了 2010 年急劇下降到只剩下 14.3%，減少了 45.2%。從這也可以看出講華語運動已經快達成其取代方言的目的了。圖一為 1980 至 2010 英語、華語及華族興衰圖。從圖一可以清楚的看出，在英語與華語的夾擊之下，華族方言快速衰微，而英語和華語則不斷成長。

表 2：家庭最常使用語言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英 語	11.6%	18.8%	23.0%	32.3%
華 語	10.2%	23.7%	35.0%	35.6%
華族方言	59.5%	39.6%	23.8%	14.3%
馬 來 語	13.9%	14.3%	14.1%	12.2%
泰米爾語	3.1%	2.9%	3.2%	3.3%
其 他	1.7%	0.8%	0.9%	1.1%

資料來源：Leimgruber (in print: 13)。



資料來源：參考 Leimgruber (in print: 13)，作者製表。

圖一：1980 至 2010 英語、華語及華族方言興衰圖

潮州人是新加坡華人的第二大族群，Li 等人 (1997) 的調查卻發現，潮州社區年青一代已經放棄族群語言，就算在家庭領域，也轉用華語或是

英語，同時語言轉用也有階層化的現象，在語言態度上重視語言的工具性價值，又把語言和族群認同分割處理。他們的調查顯示，就算是多數族群在政府的社會政策下，也會覺得有必要放棄傳統的生活方式及母語，以換取社會地位與經濟利益。Gupta 與 Siew（1995）以民族志的方式進行新加坡家庭的語言移位調查，結果發現同樣是由方言移位至英語及華語，他們從態度以及社會壓力探討語言移位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華語被分工為維護華人傳統價值和文化，但是在祖孫三代的家庭，卻見到不少祖父母屈就兒孫的語言使用，而非依傳統的孝道美德，晚輩順應長輩的語言選擇。另外，在態度上，他們發現華語運動造成華人認為方言沒有實際價值及地位低落。在語言使用上語言代溝造成代與代之間溝通困難，親情維繫不易。作者指出華語運動反諷之處（Gupta & Siew, 1995: 313）：「發起講華語運動的目的正是為了以華語統一新加坡華族並且為了傳承中國文化和傳統。」Kaplan 與 Baldauf（2003）指出，新加坡的語言移位改變了語言生態，造成新加坡成為語言越來越同質化的社區。另外，把語言和族群身份綁在一起也降低了新加坡雙語互通的程度，過去在華人社區有不少人會說馬來語，在馬來社區則有不少人會說華語跟泰米爾語的雙語者。

吳英成（2010）將華族家庭用語的變化，歸納為兩個過程：「脫方入華」與「脫華入英」，這兩個趨勢。前者大致上已經完成，後者則於 2004 年成為事實。根據新加坡教育部針對華族小一新生家庭常用語的調查（吳英成，2010：52），華族家庭用語正朝向「脫華入英」的方向。小一學生在家講華語的比率，1980 年有 25.9%，到了 1990 年達到最高峰 67.9%，接著逐年遞減，2000 年為 45.4%，2004 年為 43.6%。然而，小一新生在家講英語的人數則不斷上升，從 1980 年的 9.3% 增至 1990 年的 26.3%，2000 年上升到 40.3%，2004 年則達到 47.3%，首度超越華語，2009 年的資料顯示，小一新生在家講英語的人數將近 60%。

華族家庭用語變遷的方向，可以從語言地位的高低加以解釋。華族方言雖然人數眾多，具有人口優勢，不過，非但沒有任何官方地位，更是華語運動要剷除的目標。家長未能將母語傳承給下一代是語言流失的主因（Fishman, 1991; Romaine, 1989）。父母對母語的態度深受語言政策影響，

語言分班制一方面以汙名化的方式，將母語醜化為讓人看不起的後段班語言；強勢語言則被美化成唯一有價值的語言資源，是前段班的語言（Skutnabb-Kangas, 2000），弱勢語言常和低社會地位和形象牽連在一起，其族群成員常常避而遠之，改用其他的語言（張學謙，2011）。這應該是「脫方入華」的社會心理因素。

華語較少受到汙名化，相反的，在官方的語言分工，還被指派為族群文化象徵。同時華語享有官方語言的地位，按理說，應該和英語平起平坐，為何還會產生「脫華入英」的現象？英語和華語的地位實際上並不均等，英語是實際的官方工作語言，享有各族群共通語的地位，而華語則是華族內部的共通語，在地位上雖然高於方言，卻無法與英語平起平坐，畢竟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必知英語的雙語政策，英語為主導，華語是附屬的語言。語言分班制引發的語言移位作用，同樣發生在華語身上，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家庭轉用英語，同時語言也出現階層分化的現象。湯雲航、吳麗君（2006）認為，家庭語言逐代移位和語言階層分化顯示，華語的地位不高，已經成為社會上較不成功人士、教育程度不高人士的語言。趙守輝、劉永兵（2008）調查新加坡家庭背景、父母語言態度及社經地位和家庭用語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顯示：一、家庭用語和居住條件正相關性表示新加坡正邁向一個按語言劃分階層的社會；二、華語與英語非功能互補現象，呈現一面倒的趨勢，因為英語的聲譽和使用價值較高，只有英語學習受到鼓勵；三、約三分之二自認為英語口語不太好的家長，仍然堅持以英語與孩子交談。他們的研究顯示，華語在聲譽方面遠不及英語，「華語正在成為一種貧窮和邊緣化的身份符號，這種貧窮和邊緣化的自卑意識，反過來又導致了華語在家庭中運用的加速下降」（趙守輝、劉永兵，2008：135）。

總之，英語為頂層語言，華語為高層語言，方言殿後為底層語言。這三者地位的高低是其語言能否保存的關鍵因素之一。張裕宏（2005：261）將語言市場做不平等的分配，導致弱勢語言一個一個接著消亡的共通語，形容為「吃人的共通語」。他認為共通語雖然表面上有如天使般的無害，實際上，共通語後來可能成為唯我獨尊的共同語，變成吃人的虎姑婆。新加坡的例子就是如此，馬來語共通語的地位被英語取代後，就成為象徵性

的國語，沒有實質的功能和地位；原本福建話作為華人共通語的地位，政府以華語取代後，急劇衰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當華語將方言鯨吞蠶食之後，接下來，華語可能也難逃同樣的命運。趙守輝、劉永兵（2008：136）已經就此提出預言：

出於在爭奪文化資本的競爭中不甘人後的心理，定會有越來越多作為兒童用語「隱形規畫者」(invisible planner)的家長們，再次發揮他們過去二三十年在促進語言變更中(從方言到華語)的巨大作用，更加勤勤懇懇、不惜餘力地為攀上英語這個社會階梯，第二次變更他們的家用語(從華語到英語)。

何以採用多元主義的語言政策，在語言實踐上卻形成英語獨霸的語言生態？艾布拉姆·德·斯旺（2008：153）提出的悖論值得參考，他說：「其政策本為促進語言多樣化，卻事與願違，反而鞏固了英語的霸主地位……要推廣的語言越多，英語的使用頻率就越高。」本文認為獨尊英語的現象，並非如德·斯旺在討論南非案例所說的，「好心的政策如何帶來了惡果」（2008：153），如果從「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 (Phillipson, 1992) 及「語言歧視主義」(linguism) (Skutnabb-Kangas, 2000) 的觀點加以檢視，就能發現國家常將語言資源與權利做不平等的分配，導致名為多語政策，卻造成獨尊單語之實，而新加坡的案例則反映了 Tollefson (1991) 所說的「規畫語言就是規畫不平等」(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伍、結論與建議

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多文化的國家。新加坡語言政策是管理語言多樣性的工具，同時需要達當局設定的社會語言目標，整體而言，必知英語雙語政策成功的達成以下的社會語言目標 (Pakir, 2001:342)：

1. 為這個欠缺腹地又缺乏資源，只能依靠人力資源的小島提供快速的經濟發展；
2. 在多元族群中，推廣一個共同的溝通模式；

3. 在人口最多的華人族群，其內部存在五種互不相通的方言，推展共同的溝通模式；
4. 賦予國內語言與文化多元主義官方承認；
5. 打造奠基於亞洲和東南亞傳統的新加坡認同和忠誠感；
6. 融入馬來語為多數的區域；並且
7. 促進順暢的國際接軌和區域交流。

本文從語言管理、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這三方面討論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在語言管理方面，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必知英語雙語政策，將馬來語定為僅具象徵意義的國語，然後將英語定為實際的官方工作語言及全國的共通語，同時賦予族群語言官方地位，除了作為族群本身的共通語，還賦予族群認同和文化傳承的功能。新加坡語言管理背後的意識形態有多樣，其中傾向多元並立的意識形態為多元文化主義或多族群主義，而語言問題論及實用至上的語言意識形態則導向獨尊單語。從語言實踐可以看出語言地位對語言生態的影響，新加坡雖然成功的推展共通語，卻是以弱勢語言為代價，華人的方言急劇流失，而華語也因為不敵英語的強大勢力，節節敗退。語言地位與語言移位之間的關聯，印證了 Kymlicka (威爾·金里卡，2004：156) 的論點：

當今世界，除非在公眾生活中使用，否則一種語言很難長存，這一點證據確鑿。因此政府決定哪些語言為官方語言，實際上就是決定哪些語言將繼續存在，哪些語言將死亡。

新加坡政府雖然賦予三個族群語言官方語言地位，不過，卻沒有給予和英語平起平坐的實際功能，頂多只能算是互補功能，難怪族群語言面臨被英語取代的危機。族群語言地位不彰，從它們在學校教育的地位就可以看出，英語是教學語言，母語不過是一門學科。

台灣族群語言在獨尊華語，族語缺乏官方地位及制度性支持不足之下，就算人口最為多數的福佬族群也面臨母語流失的狀況，如何逆轉母語流失，邁向添加式的雙語現象是當前語言規畫的重點。台灣和新加坡一樣，都面臨族群語言急劇消逝的危機。新加坡政府早就賦予族群語言規畫地

位，雖然，提供族群語言一些制度性的支持，不顧，由於採取「英語擴張典範」(dif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強調「對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單語觀點」(Phillipson & Skutnabb-Kangas, 1996: 429) 導致族群語言受到嚴重的衝擊，形成削減式的雙語現象。新加坡的經驗顯示，對於共通語的推行，不能毫無節制，就像 García (1992) 語言花園比喻所暗示的，如果不加管理的話，強勢的花卉會蔓延到整個花園，造成其他小型的花卉無法生存，花園的管理者需要捨棄自由放任的做法，抑強扶弱，才能維持語言花園的多樣性。新加坡的例子顯示，法理上的語言地位平等，要是無法落實在實際的語言使用的地位和權力，恐怕是中看不中用的官樣文章。如果僅重視語言的經濟價值，卻忽略了語言的社會心理功用，特別是家庭代際的親情溝通與族群之間的身份認同的歸屬需求。國家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個人生命的完全發展，這是當代憲法規範的最高準則。本文建議，國家應該以建立共通語與母語共存的添加式雙語現象為目標，以「語言生態典範」(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 (Ricento, 2000) 為規畫取向，推行能確保族群語言延續、語言資產的發展及語言人權的維護的語言規畫與語言政策。

參考書目

- 艾布拉姆·德·斯旺（喬修峰譯），2008。《世界上的語言：全球語言系統》。中國廣東：花城出版社。
- 吳英成，2010。《漢語國際傳播：新加坡視角》。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光耀，1996。《李光耀 40 年政論選》。新加坡：時代出版社。
- 周清海，1995。〈語言與教育〉收於雲惟利（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頁43-73。新加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洪鎌德，2002。〈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 543-84。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韋洪，2003。《東南亞五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國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大明、李巍，2007。〈新加坡語言政策研究報告〉收於徐大明《社會語言學研究》頁 103-19。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尹羸，2007。《新加坡「講華語運動」的語言行銷分析》碩士論文。台東：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 張楚浩，1995。〈華語運動：前因後果〉收於雲惟利（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頁 125-37。新加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張裕宏，2005。〈Ui 少數人語言暴力到多數人語言暴力的語言市場倫理：台灣中原化的華夏傳統模式初探〉收於林哲民（編）《張裕宏教授論文選集》頁 259-71。台北：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張學謙，2006。〈印度的官方語言地位規畫：第八附則與語言承認〉《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 卷 4 期，頁 131-68。
- 張學謙，2008。〈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愛爾蘭語言復振為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 卷 4 期，頁 21-47。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許小穎，2007。《語言政策和社群語言—新加坡福建社群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郭振羽，1995。〈語言政策和語言計劃〉收於雲惟利（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頁 57-73。新加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陳松岑、徐大明、譚慧敏，2000。〈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情況的研究報告〉收於李如龍（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頁 48-90。中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陳照明，1995。〈第五章小學華文教材和華語政策〉收於雲惟利（編）《新加坡

- 社會和語言》頁 91-111。新加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湯雲航，吳麗君。2006。〈新加坡語言政策與官方語言的功能〉《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6卷3期，頁 20-26。
- 黃庭康（李宗義譯），2008。《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台北：群學。
- 董霄云，2008。《文化視野下的雙語教育——實踐、爭鳴與探索》。中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鄒嘉彥、游汝杰，2003。《漢語與華人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趙守輝、劉永兵，2008。〈新加坡華社家庭用語的社會語言學分析〉《社會科學戰線》8期，頁 131-37。
- 劉滿堂，2000。〈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多語制和雙語制〉《陝西教育學院學報》16卷4期，頁 77-79。
- 威爾·金里卡（鄧紅風譯），2004。《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公民權》。台北：左岸文化。
- 謝世涯，1995。〈華語運動：成就與問題〉收於雲惟利（編）《新加坡社會和語言》頁 139-57。新加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Aidil, Subhan. 2007. "Planning for Malay Language in Education: Lessons of History and Present Ecology," in Viniti Vaish, S. Gopinathan, and Liu Yongbing, eds. *Language, Capital, 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p. 157-74. Amsterdam: Sense Publishers.
- Bokhorst-Heng, Wendy. 1998. "Langua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in J. A. Foley, T. Kandiah, Bao Zhiming, A. F. Gupta, L. Alsagoff, Ho Chee Lick, L. Wee, I. S. Talib, and W. Bokhorst-Heng, *English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Reflections from Singapore*, pp. 287-319.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A. 1971.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Fishman, Joshua A. 1972.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arcía, Ofelia.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in Heidi Byren, ed. *Language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pp. 1-27. Lincolnwood, Ill.: National Textbook Co.
- Gupta, Anthea Fraser and Siew Pui Yeok. 1995. "Language Shift in a Singapore Famil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6, No. 4, pp. 301-14.
- Haugen, Einar.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nberger, Nancy H. "2002.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An Ecological Approach." *Language Policy*, No. 1, pp. 27-51.
- Kaplan, Robert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Kaplan, Robert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2003.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Kelman, Helbert C. 1971. "Language as an Aid and Barrier to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System," in Joan Rubin, and Bjorn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 pp. 21-51.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Kiong, Tong Chee, and Anne Pakir. 1996. "The Making of National Culture in Singapore," in Edwin Thumbo, ed. *Cultures in ASEAN and the 21st Century*, pp. 174-88. Singapore: UniPress, Centre for the Art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ASEAN-COCI.
- Leimgruber, Jakob R. E. in print. "The Management of Multilingualism in a City-Stat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 in Peter Siemund, Ingrid Gogolin, Monika Schulz, and Julia Davydova, eds.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Urban Areas: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Teaching,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i, Wei, Vanithamani Saravanan, and Julia Ng Lee Hoon. 1997. "Language Shift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Family Domain Analysi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8, No. 5, pp. 364-84.
- Lo Bianco, Joseph. 2007. "Advantage and Identity: Neat Discourse but Troubled Union: Singapore's Medium of Instruction Policy," in Viniti Vaish, S. Gopinathan, and Liu Yongbing eds. *Language, Capital, 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 i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p. 5-24. Amsterdam: Sense Publishers.
- Pakir, Anne. 1991. "The Range and Depth of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s in Singapore." *World Englishes*, No. 10, pp. 167-79.
- Pakir, Anne. 1998.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Lubna Alsagoff, Zhiming Bao, Anne Pakir, and Lionel Wee, eds. *Society, Style and Structure in Language*, pp. 82-110.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 Pakir, Anne. 2001. "Bilingual Education with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James E. Alatis, and Ai-Hui Tan, eds.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9*, pp. 341-49.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Pennycook, Al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on, Robert, and Tove Skutnabb-Kangas. 1996. "English Only World-Wide or Language Ecology?" *TESOL Quarterly*, Vol. 30, No. 3, pp. 429-53.
- PuruShotam, Nirmala Sirekam. 1997. *Negotiating Language, Constructing Race: Disciplining Differences in Singapo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Rappa, A. L., and Li Wee.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New York: Springer.
- Ricento, Thomas. 2000.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omas Ricento, ed.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cus on English*, pp. 9-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Romain, Suzanne. 1989. *Biling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Vol. 8, No.2, pp. 15-34.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catalogue.html>) (2012/9/10)
-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llefson, James W.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 London: Longman.

Wee, Lionel. 2003.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No. 24, pp. 211-24.

Wong, Wee Kim, ed.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Zhao, Shouhui, and Liu Yongbing. 2007. "The Home Language Shif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s*, Vol. 16, No. 2, pp. 111-26.

Singapore's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and its Impact on Family Mother Tongue Maintenance

Hak-khiam Tiuⁿ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TAIWAN*

Abstract

Using Spolsky's language policy frame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Singapore's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management,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e. Singapore i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country. Singapore's language planning has been touted as a successful story in developing an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lingua franca on other languages. Thus, this paper adopts a language ecology perspective to evaluate Singapore's multilingual policy. It is found that the success of establish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s at the expense of native languag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anguage plann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 An additive bilingualism can be achieved by restraining the powerful and helping the weak.

Keywords: Singapore,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family mother tongue maintenance